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孙刚成¹, 杨姍姍^{1,2}

(1. 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2. 励志高级中学, 江苏 南京 211599)

[摘要] 基础教育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承担着基础性、支撑性和先导性的使命责任。研究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以 Web of Science (WOS) 数据库收录的核心期刊中有关“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 633 篇文献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最终发现, 国际社会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自 21 世纪以来发展较快, 且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知识基础, 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热点覆盖回归教育本质, 最大限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构筑以证据为本的高质量教育治理路径; 并强调证据来源的多样性、软化学科界限、拓展学习领域和以实践性为价值追求, 系统提高教师育人质量; 以发展本位为核心, 强调评价的可持续性和增值性。基于此, 我国应从以生为本, 构建正确的教学质量观; 遵循循证决策原则, 提升决策支持有效性; 统整课程与教学要素, 密切关注学习问题; 规范教师资格准入标准, 明确其价值取向; 建立成长反馈调节机制, 推动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等工作入手, 切实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 跨学科; 教师教育; 综合素质评价

[中图分类号] G 6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5-0027-11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质量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 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奠基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入学率及巩固率均已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但仍存在较为明显的欠缺, 如入园贵、课业负担重、课外辅导泛滥及唯分数唯升学率评价等。在新时代共同富裕激发基础教育活力和提升基础教育高质量建设水平的背景下, 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国际社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概貌, 可以帮助国内基础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直观地了解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发展动态和热点主题, 为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问题提出

基础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工程, 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

基础教育发展遵循从“教育普及”到“教育均衡”、从“有质量”到“高质量”的历史发展演变逻辑。但当前基础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管理模式和教学方式等突出问题, 难以满足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价值需求。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教师专业能力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1]; 2019 年 6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办好普通高中教育, 对于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增强高等教育发展后劲、进一步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2]。随后,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针对基础教育教学目标、课堂教学管理、师资队伍构成及作业考试辅导等做出了针对性要求^{[3][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收稿日期] 2023-12-25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 2020 年度国家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创新创业大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研究”(BIA200170); 延安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点项目“高质量教育体系建构: 科学内涵、发展逻辑与路径”(2022YDZX18)

[作者简介] 孙刚成 (1969—), 男, 河南濮阳人, 延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三级教授, 教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和课程与教学论。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系统谋划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努力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5]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6]党的二十大立足于中国时代背景，将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了教育高质量优先发展的根本立场。政策性文件的颁布是促进基础教育治理水平提升进而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要达成以上目标，国家有责任一方面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素养；另一方面需要构建系统完善且有效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切实推进基础教育发展，改善基础教育质量，发达国家也展开了有益的探索。例如美国为改善公立学校学生的个人成绩，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在《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 CCSS）中概述了从幼儿园到高中每个年级的英语和数学可量化基准^[7]，并对可量化基准进行了多次修订，以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再如日本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起步也相对较早，《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专门制定了各级各类学校设置标准，以保证统一的办学条件和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为应对复杂且难以预测的未来社会，日本基础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尤其是课程编制方面强调“资质与能力”的培养，即“知识与技能、

思考力判断力与表现力、向学力与人性”^[8]。

基于此，在全球国家高度重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之际，本研究选取来自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的 633 篇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探析当前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经验，澄清基础教育何以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关注 21 世纪以来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动态，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作为集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专业期刊的大型引文索引数据库，其高学术性和高影响力不容小觑。为此，本研究将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文献搜索源，检索时间区间设定为 2000—2022 年，运用主题检索法，检索词为“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文献类型选择“论文”（article），获得用于分析的文献数据共 633 篇。

有关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文献在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的具体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自 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关注逐渐增多，尽管中间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足见国际教育界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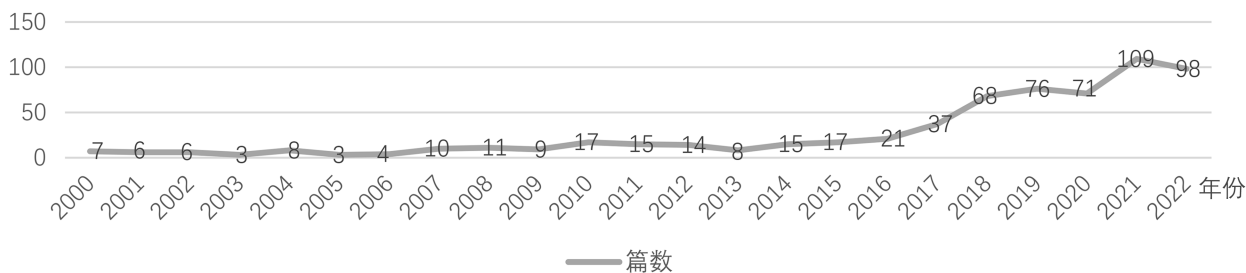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时间分布

（二）数据处理

在样本确认后，文章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生成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略）和关键词聚类表（见表 1），对 21 世纪以来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热点前沿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展示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知识全景。

三、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点

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体现了二十多年来国际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采取何种措施的价值认同和判断是基于理论层面的价值取向，具有理论指引和

实践指引双重功能。运用 CiteSpace 对来源于 WOS “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 从而绘制关键词聚类知识表格 (见表 1)。结合关键词聚类以及二次文献分析, 发现国

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围绕 5 个核心点展开 (见表 2), 也较为准确地给出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表 1 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号	聚类信息
0	future specialist; scientific thinking; structural analysis; method
1	continuing education; prerequisite; training; education
2	Zambia; aid; vulnerable children; risk; basic education
3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hysical fitness level; student; education
4	collaborative project; future; education
5	education major; academic gain; credential; classroom quality; teacher
6	10 – year special education master degree program; case; evaluation; education
7	pedagogical competency;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ssessment; teacher; challenge
8	reality today; baseline data; education; development
9	large – scale study; third grade; student behavior; day; classroom quality
10	Chilean school; ICT; learning; lesson; education
11	stay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ccess availability; case
12	developmental science; teacher quality; effort; role; education
13	success story; trainer; enhancing personal wellness
14	preparing future teacher; physics pedagogy; physics; graduate – level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
15	evidence – based; support strategy; original report; national guidelines education; working group
16	experiential learning method; studen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7	learning environment; developmental gradi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 cross – domain link; teacher – child interaction
18	teacher quality; developmental science; negative evaluation; controlling style; school failure
19	question learning; in – service teacher trainingprogramme

表 2 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核心主题表

序号	核心主题	聚类信息
1	回归教育本质, 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1/2/3/9/13/17
2	构筑以证据为本的高质量教育治理路径, 并强调证据来源的多样性	6/11/13/15
3	软化学科界限, 拓展学习领域	4/9/10/16/17/19
4	以实践性为价值追求, 系统提高教师育人质量	5/7/12/14/18
5	以发展本位为核心, 强调评价的可持续性和增值性	6/9/17

(一) 回归教育本质, 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基础教育是学生身体、智力、道德、心理以及情感快速发展的关键性时期, 学生在该阶段所接受

的教育质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身体和认知发展水平。从该角度出发,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指向的是回归教育本质,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回归教育本质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实践性问题。英国教育家洛克在17世纪提出了“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张白纸。通过教育,学习者可以掌握知识和美德^[9];18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将儿童从社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回归自然,“培养自然人”^[10];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在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中提及教育的目的是“德”,教育的方式是“教”^[11];20世纪,杜威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主张“教育即生长”,认为“教育是经验的转化或重组”。这种转化或重组不仅可以增加经验的意义,还可以提高指导经验后续过程的能力”^[12]。不同时期的教育家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但仍有共通点——教育自始至终围绕学生,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所以,可以认为教育的本质实现是一种促进人发展,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的过程。也正是因为教育本质观的存在,现阶段各国在开展基础教育活动时,均基于学生发展梯度和身心健康制定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此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如包容性教育,旨在帮助有残疾和没有残疾的儿童,包容所有人类多样性;创新性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信息技术教育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13]。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回归教育本质,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做了有益探索。其中,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研究关注度较高。当前,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已经由关注外部因素,如课程、政策、教学设施、教学材料以及教育经费,转向学生内在体验研究,研究集中在学生的内在情感、信念和动机等微观心理视角。如瓦西里基·库拉(Vasiliki Koula)对学校人际关系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创造积极的学校文化、开放的学校氛围和“共同的文化准则”,使学生产生较高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其个性的全面持续发展^[14]。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自我效能通过一种普遍的机制,即“改变个人对自我掌控和成功的期望”,继而改变行为维度^[15]。莫赫(Meher)等人强调自我效能能力的增强可以提升

学生对自己学术实践的信念,使他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继而通过发展优势来减少自己的劣势,增强其学业成绩和实现更高阶目标的欲望^[16]。因此,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实施提升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学习活动来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从而基于根本问题提升基础教育的实施质量。此外,弱势群体作为基础教育中特殊的存在,需要特殊且健康全面的方式促进其全面发展,确保儿童在社会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与国家政策支持、家庭氛围和学校管理等都有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依恋感间接影响弱势群体的发展程度^[17]。基本的护理游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弱势群体全面发展。马克穆多夫(Makhmudov)强调了基本护理游戏在弱势群体中的重要性,提出游戏元素和游戏角色任务需要根据弱势学生对训练材料的掌握程度来确定^[18]。

(二) 构筑以证据为本的高质量教育治理路径,并强调证据来源的多样性

高效的基础教育治理被视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基础教育由普及化向优质化发展的转变,学生和家长都在寻求更优的教育质量,基础教育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基础教育学校被迫要求以多种方式且较少资源做更多、更高质量的工作。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学校必须应对学生数量变化的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员工待遇和教学质量、减轻教师负担、加大教育资金投入、扩大学生就业前景以及提高学校治理能力等一系列事务的压力^[19]。在这个充满挑战且不断变化的复杂环境中,以科学为根据的决策需求不断增加,循证管理越来越受关注^[20]。循证管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鉴于英国政府越来越强调需要基于准确证据的基础政策和实践。特别是对公共服务有效性的关注,逐渐促成了许多学科的详细指导方针和最佳实践手册的发展^[21]。循证管理也是循证医学在管理领域的延伸,被定义为“系统地基于最佳可能证据开展管理分析、行动和决策”^[22],该管理方式强调以证据为本,研究尤其关注证据来源的专业性和多样性。尽管以证据为本的教育治理在基础教育阶段起步较晚,但鉴于国际社会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现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循证管理路径。胡里奥(Julio)等人认为,循证管理是一个倍增效应,通过共享知识,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显性知识,并提

出一个可行性实施流程,即提出有效的问题—选择性搜索证据—对证据的批判性评估—在具体案件中应用证据—评定^[23];桑米(Salmi)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循证管理步骤,形成了循证管理的4个步骤:(1)对学术文献进行审查,从而使用已发表的科学研究结果作为最佳的可用科学证据,开展基于文献循证的同行评议;(2)借助实地考察研究,系统地收集组织事实、指标和佐证材料,从实践中获得证据,然后进行循证分析;(3)在减少偏见和提高决策质量的程序、实践和框架协助下进行评估;(4)权衡决策对利益相关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伦理考虑^[24]。国际基础教育治理在强调以证据为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其来源的专业性与多样性。如基于PISA成绩,芬兰的基本教育系统被提出作为良好实践的样本,并被国际作为成功且可靠的例子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提升该国基础教育的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25];菲律宾的校本管理模式(School-Based Management)强调以证据为本的管理模式,将权力以及资源转移到学校层面,将教师、社区的主要领导者、家长纳入决策机制^[26]。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培养了具有功能性特点的识字菲律宾人。除此之外,以证据为本的管理路径对其他领域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过程中,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各种软性、定性的证据,如具有良好实践的例子、叙述和经验交流,来证明和指导政策措施和目标;雅虎(Yahoo)会进行很多次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它的网站设计会有细微的变化,以观察哪种设计和呈现方法可以吸引最多的访问者和购买量;电视购物频道通过分析实时数据来确定特定产品的展示和推销;美国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Enterprise Rent-A-Car每月发放10万份以上的调查问卷,以监控其销售点的顾客服务^[27]。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基础教育、政府还是企业,当管理路径以证据为本时,就会享有较高的竞争力。学校和管理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依赖证据和逻辑,而不是猜测、恐惧、信念或祷告。

(三)软化学科界限,拓展学习领域

该主题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合作项目、跨学科、体验学习、问题以及环境教育等。这些关键词聚焦基础教育的跨学科教学策略,体现了现阶段国际社会对软化学科边界,拓展学习领域的关注。有效的跨学科教学策略是促进学科融合,拓展学习领

域,保障学生学业质量的关键,跨学科教学中的情境化、合作化和以问题为中心等3种策略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跨学科教学一般都是在课堂层面开展,几乎所有探讨跨学科的文献都首先会涉及情境、合作和问题教学策略,足见其在跨学科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切提帕拉姆(Chettiparamb)在描述以人文主义目标为指导的“跨学科”时,提出了关于跨学科的两条思路之间的联系,“跨学科”是“带来一个无所不包的意义框架”,最常用于“与人有关的科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另一方面,“跨学科”工作旨在解决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中发现的复杂现实问题^[28]。由此也可以验证,情境、合作联系和问题是跨学科教学中的核心部分,任何一个跨学科教学都需具备这3个要素。

情境化作为跨学科教学的第一种策略,是一种将任何学科材料嵌入时代、文化和个人经验结构中的方法,科学史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利用时间和历史作为一种整合的工具(历史作为背景)^[29]。情境化策略作为跨学科教学最为关键的策略之一,不但是过去教学发展的重要转变之一,而且在当今基础教育跨学科教学中仍非常重要。对此,雷耶斯(Reyes)等人通过研究表明,在跨学科学习过程中,情境化是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学校在将学生的背景与学校所教的数学内容联系起来的同时,也促使学生主动将真实情况与其课程相联系,从而使课堂教学变得有意义^[3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社会责任。如,澳大利亚的英语教学,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时,需要关注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背景下语言表达和书写的多样性,还要通过对原住民传统文学作品的阅读,领会不同语言背景下社会、历史方面的不同,从而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31]。此外,国际基础教育在教学过程中也增加了跨学科教学的信息化资源,在可视化的情况下进行跨学科教学。如学校支持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构建第三虚拟空间和学校后花园的建设,教师则经常引进视频剪辑、网站和IPAD^[32]。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学生以更大的好奇心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以此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合作化是跨学科教学的第二个策略。在统计学意义上,采用跨学科学习方法的学生在理解、反思和批判性思维发展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平,而合作

学习基于批判性思维系统分析人际关系和战略行动,可以使学习者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更强的感知^[33]。此外,与多学科合作不同的是,跨学科合作策略更强调利用多学科方法或跨学科方法进行实施。在跨学科合作策略实施下,它不仅强调学科之间的系统整合,还注重教育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合作与沟通。学科之间的系统整合是跨学科合作教学中最为常见的存在,如代数和几何、物理和生物和历史和地理可以围绕线性、变化和尺度等核心概念结合在一起^[34]。教育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是基于某一目标而协同努力,并形成合力或集合体。芬兰政府为了确保每位儿童都能够经历连续的学习路径,特别强调学前教育工作者与儿童的监护人、其他阶段的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合作^[35]。例如,卡皮莱小学(Käpylä Peruskoulu)每年都会任命教师专门负责与学前班对接,确定合作内容与形式,并在行动计划中说明具体的实施情况^[36]。

以问题为中心是跨学科教学的第三个策略,其旨在整合调动不同学科工具来解决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或复杂问题。例如,学生们引入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技术和心理学,让它们因一个问题而聚合^[37]。这个以问题为基础的聚合与跨学科教学情境化策略类似,需要整合相关学科内容进行分析,从而使不同领域彼此密切互动,有效提升与其他领域之间广泛的外部联系,并在联系之中实现系统化,从而创新性地解决复杂现实问题。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教学策略能够为学生带来足够的挑战,帮助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个人发展与社会贡献能力。

(四)以实践性为价值追求,系统提高教师育人质量

在基础教育体系中,国际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呈现出明显的实践性价值追求,越发关注教师的相关专业经历,如实践、工作经历等。芬兰对基础教育系统教师申请者的要求除了硕士学位外,还要求必须完成60学分的教育教学项目^[38]。美国各州对幼儿园教师任教资格的规定有很大差别,但是,所有州都规定幼儿园教师资格申请者必须具备专业的训练和教学实习^[39]。日本对于教师申请者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考核制度,申请者通过选拔考试后,必须进行研修;日本《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第23条规定为,“被录用之日的1年内,为履行教师职

务所必须的全实践性的研修”^[40]。通过对教师专业实践性的审查,可以将不具有专业背景的申请者排除在队伍之外,具有实践性准入规定的增加提高了基础教育师资的专业性、施教能力和教师素养。同时,实践性的价值追求强调的是多元化指标,而非单一性指标(理论知识),避免了甄选教师的片面性,为经验丰富的教师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保证了基础教育教师的供给质量。此外,如何增强教师实践、提升教师质量也是国际社会研究的重点所在。越南在基本实现初等教育普及化后,将政策重心转向教师教育改革,主要通过拉长实践时间来增强教师实践技能。越南教师的最低学历从12年通识教育+2年教师培训教育(12+2)逐渐发展为(12+3)和4年制课程(12+4)^[41]。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则侧重于将教师的实践嵌入更广泛的教学环境中,并以两种产品(注释教案和共同评估)的形式保存下来,该做法可以促进教师间的共享并传递给新教师^[42],这不仅有助于创建一个使未来教师更容易从其他教师的智慧中受益的系统,还有利于教师培养探究的习惯和技能,使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积极地为改进其专业的知识库做出贡献。

(五)以发展本位为核心,强调评价的可持续性和增值性

评价被普遍认为是教与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在决定学习者学什么和教师教什么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最快方法是更新其评估系统。现阶段,除了必要的理论知识测评之外,“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协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也被作为评估学生和教师的重要指标。由此可以看出,各国在基础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中,均将重心从“唯分数”转向“综合素质”,希望从根本上找到影响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更为直接地消除其发展隐患。事实上,综合素质评价相较于“唯分数”评价方式,其最大的益处在于它在理念上是以发展本位为核心的评价,将学生看作发展中的人,兼具甄别和育人目的。这种评价模式在评价过程中尤为强调可持续性和增值性,并超越了普通的评价价值和甄别意义,是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学生个性的活动为目标的评价。对此,各国均强调“综合素质”评价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最大化地保障学生的发展。如美国基础教育评价系统 Partnership for Assessment of Readiness for College and Careers

(PARCC)和 Smarter Balanced Assessment Systems (SBAC)贯穿于整个中小学阶段,它通过综合素质评价来衡量学生是否达到进入大学或职业发展的要求^[43];新加坡为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相继提出了校群督导制度、全国统考制度和卓越学校模式等改革措施^{[44][45][46]};日本文部科学省则在基础教育评价改革中引入学校“第三者评价”,以期加强基础教育的监督机制,完善已有的基础教育评价体系^[47]。

四、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提升教育质量话语体系的不断推演,过程性质量要素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实践者和研究者关注^[48]。基础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丰富、适宜的课程、治理模式、教学方式、评价模式以及合格、专业的教师是高质量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实现教育强国梦和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如何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更好地培养创新创造型人才,是我国基础教育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为此,深入探析国际上相关国家的最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经验,对构筑我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有一定的补短和取长意义。

(一) 以生为本,构建正确的教学质量观

基础教育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其目标和侧重点均有所不同。我国的基础教育在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大众对基础教育的要求已不再是“有学上”,发展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和体系化,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也随着内外部压力不断增加。借鉴国际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回归教育本质,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围绕基础教育的本质、实践要求等内容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育人为本,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应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核心地位^[49],明确了基础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核心命题,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基础教育均遵循“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但很多学校教学实践与规章制度相冲突,家校社三者的利益矛盾较为突出,没有形成一致的教育诉求和联动的教育合力,“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尚未

被充分重视。为此,首先应尊崇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厘清目前相关利益者所关心的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把基础教育真正引向因材施教各展其长的发展道路上,为加快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提供科学的基础与方向。其次,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空间,为家校社合作机制提供条件,解决各环节合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权责不清和协作路径不明问题,从而搭建以正确教学质量观为基础的实践平台,保障“以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落地,推进基本范式的转变(“教学为中心范式”转向“学生为中心范式”)。

(二) 遵循循证决策原则,提升决策支持有效性

循证管理是促使决策效益最大化的基础,是促使基础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相关治理主体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分析基础教育教学问题,用证据或成功经验说话,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创新基础教育有关制度,提高政策效率与基础教育发展质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完善办学制度,强化从严治校机制,不断健全教育管理制度体系”^[50]。循证决策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1)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任何一项制度都要有“强证据”来支持;(2)循证决策要有完善的“知识管理”战略步骤作为支撑,要有信息平台、专家参与,广泛整合各种利益,有对纵向、前后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比较,横向制度的比较分析等^[51]。基于此,各主体应在基础教育体系治理过程中,保持教学过程的开放性与透明性,化数据为证据,构建基础教育体系利益共同体;同时利用同行评审或专家评审模块整合同行、专家对当前基础教育体系治理的关键性看法,整合外部助力,开拓科学严谨且行之有效的基础教育治理新局面。此外,还需要考虑直接利益者观点和外部因素。借助学生满意度调查、教师满意度调查、评教和评学访谈等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厘清教师和学生等直接利益者的态度和诉求,并作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同时,通过整合当下及未来企业发展趋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等数据,对影响其治理结构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借助外部环境证据,进一步提升决策支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 统整课程与教学要素,密切关注学习问题

在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背景下,横向上激

活各教育要素以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举措,亦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为此,首先,应统整课程与教学相关要素,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52]。教材统整、三类课程统整、学习能力统整以及课内外统整被看作课程与教学要素统整的4个主要层次。第一层次是教材统整,即对教材体系作结构性调整,使之更适合于学生的学与教师的教;第二层次是三类课程统整。以教材统整为基础,将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与探究型课程统整起来,形成适宜于学生学习的体系,防止学习内容的相互割裂;第三层次是学习能力统整。在课程内容统整的基础上统整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和探究性学习等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在探究中学会探究,防止学习能力培养与学习内容的割裂;第四层次是在此基础上将德育、课内课外的学习与教育活动等作统一设计安排,这称之为“课内外统整”^[53]。在一定程度上摒弃只重课堂教学的惯习,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交互,打开课堂的“黑匣子”,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其次,要严把教学过程关,密切关注学习问题,建立健全学生学习过程监督机制,实施动态管理,对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零容忍”。以学习问题与学生发展为中心,以真实学习情境为依托,借助跨学科教学方式实现体验式深度合作^[54],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学本质、论证本质和科学方法的教学实现,促进推理与思考方式在科学教学中得以体现,也可以在无形中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推动其技能与素养发展。

(四) 规范教师资格准入标准,明确其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催生新的教师准入标准,构建新的教师准入标准成为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种战略选择。尽管国际社会的教师准入标准条例有所差异,但其标准条例折射出诸多的共性取向。这些共性是各国发展基础教育过程中的宝贵经验,为我国在建立教师资格准入制度过程中统一认识提供了借鉴。首先,夯实教师理论知识基础。正如《礼记·大学》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可以应用于学生,教师作为学习者的引领者、行为模范者,更需要以身作则,不断在知识、技能和行为上不断反思求进^[55]。当教师

对理论知识有充分的认识、理解、认同与欣赏时,才可以通过师生互动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此,应在教师教育、职业准入和在职发展等阶段,明确培养目标与规格,通过出台相关教学标准、培训标准和教师资格准入的标准等政策文件,搭建教师知识能力框架。其次,重视实践性原则,提高求职人员的实践准入门槛。在教师准入制度中加入对求职人员6个月以上的教育专业实践经历考察,并逐步过渡到12个月以上,鼓励高水平师范大学扩大“4+2(2年在职研究性学习)优师培养”计划,明确要求求职人员在资格认证上,提供课程、培训或工作实践证明等必要材料,严格把控入口关,强化教师入职前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基础,确立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研究型教师专业发展方向^[56]。

(五) 建立成长反馈调节机制,推动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

基础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关乎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必然需要高质量的教育评价作为支撑。本研究通过对国际基础教育评价体系的关键词聚类分析发现,国际社会更偏向于关注学生的自身发展,并将可持续性和增值性作为构建评价体系的关键性要素,为我国构建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方向。一是摒弃唯分数论。唯分数论本质上是一种只注重以分数为表征的纸笔测验成绩,且以此作为唯一标准对学生和教师甚至是整个教育成效做价值判断和优劣判定的活动^[55]。在该意义上,唯分数论只会一定程度上加剧过度教学、课业负担、课外辅导泛滥等棘手的教育问题,阻碍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二是开展综合素质评价,从“对学习的评价”转向“为了学习的评价”^[57],促进发展与增值。综合素质评价与唯分数评价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其关注点在于人的全面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个体差异性、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以及学生与教师持续性反思。这为开展高质量学生评价提供了根本保障,也完全契合了新时代对基础教育评价的要求。此外,在综合素质评价过程中既要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适应学生个人发展的评价内容,又要认识到教师的影响力,才能最终促进学生的自我评价,实现以评价促发展、在评价中学会学习与发展、在评价中不断提升学习品质与发展质量,从而引向学生的自我成长与终身发展。三是借助调查问卷、访谈以及AI课堂智能分析,打开基

基础教育课堂教学的“智慧之门”^[58]。AI课堂智能分析的特点在于其便捷化、规模化和非介入式,它利用了现代信息技术的收集方法、现代信息技术的挖掘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分析方法形成科学的命题,将主观的经验转换为客观的数据。该评价模式超越了课堂教学的传统分析路径,将感性论断与理性诊断相结合,回归真课堂,继而提高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成效。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8-02-01 (1).
-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19 (6): 7-11.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9-07-09 (1).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 (22): 14-19.
-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N]. 人民日报, 2020-11-04 (1).
- [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7] ZYGOURIS - COE V. Disciplinary literacy and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J].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2012, 32 (1): 35-50.
- [8] 中央教育审议会. 幼儿园、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及特别支援学校的学习指导要领等的改善以及必要的方法等 (答疑) [EB/OL]. (2017-01-10) [2023-12-25]. 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icsFiles/afieldfile/2017/01/10/13809020.pdf, 2016.
- [9] MENG F, QU X. On the Strategy of Post-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2022, 11 (2): 50-54.
- [10] LU Y. Exploring Jean-Jacques Rousseau's nature education thought from Emile [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 Paris: Atlantis Press, 2019: 419-422.
- [11] FEDCHYSHYN N O, PROTNER E. Herbart and Herbartianism in European Pedagogy: History and Modernity [J]. Медична освіта, 2020 (2): 25-31.
- [12] DEWEY J. Democracy in education [J].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1903, 4 (4): 193-204.
- [13] MORGANTI A, PELLEGRINI M. Education Should Return to Its Essence [J]. Science Insights Education Frontiers, 2021, 9 (2): 1213-1216.
- [14] KOULA V.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tween teachers and betwe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factors in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 personalities [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015, 4 (1): 481-495.
- [15] BANDURA A. Self-efficacy mechanism in human agenc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2, 37 (2): 122-147.
- [16] MEHER V, BARAL R.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Efficacy Scale for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f Odisha [J]. Shanla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0, 8 (4): 90-100.
- [17] DOZIER M. Attachment-based treatment for vulnerable children [J].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003, 5 (3): 253-257.
- [18] SHUKHRATOVICH M K. Importance of didactic games in speech development of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J]. Asian Journal of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2022, 11 (11): 20-23.
- [19] JONES O, CRAVEN M. Beyond the routine: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Teaching Company Scheme [J]. Technovation, 2001, 21 (5): 267-279.
- [20] BABA, V. V. AND HAKEMZADEH, F. Toward a theory of evidence based decision making [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2, 50 (5): 832-867.
- [21] TRANFIELD D, DENYER D, SMART P.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developing evidence-informed management knowledge by means of systematic review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3, 14 (3): 207-222.
- [22] RYNES S L, BARTUNEK J M.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Foundations, development, controversies and future [J].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7 (4): 235-261.
- [23] DEL JUNCO J G, ZABALLA R D R, DE PEREA J G Á. Evidence-based administration for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ramework of knowledge strategic management [J].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2010, 17 (4): 343-363.
- [24] SALMI J.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Lessons of experience [J]. The road to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making of world-class research universities, 2011 (1): 323-347.
- [25] SIMONS M. Governing education without reform: The power of the example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

- 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015, 36 (5): 712 – 731.
- [26] SOMPRACH K, TANG K N, POPOONSAK 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leadership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Thai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J].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2017, 16 (2): 157 – 175.
- [27] PFEFFER J, SUTTON R I. Why managing by facts works [J]. Strategy + Business, 2006 (1): 1 – 2.
- [28] CHETTIPARAMB A. Interdisciplinarity: a literature review [J]. repor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Group,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07 (1): 1 – 64.
- [29] NIKITINA S, MANSILLA V B. Three strategies for interdisciplinary math and science teaching: A case of the Illinois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cademy [R]. MA: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2003: 21.
- [30] REYES J, INSORIO A O, INGRESO M L V, et al. Conce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ontextualization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2019, 6 (1): 1 – 18.
- [31] 杜文彬. 澳大利亚中小学课程结构改革及其启示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7, 46 (9): 37 – 48.
- [32] DEVLIN M, NELSON K, KIFT K, et al. Effective teaching and support of students from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backgrounds: Practical advice for teaching staff [M]. Sydney: Offic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12: 22.
- [33] BASSACHS M, CAÑABATE D, SERRA T, et al.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approaches to foste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 (20): 1 – 17.
- [34] CHETTIPARAMB A. Interdisciplinarity: a literature review [J]. repor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Group,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07 (1): 1 – 64.
- [35] 徐晨盈, 吴刚平. 芬兰国家核心课程中的幼小衔接: 理念、路径与启示 [J]. 外国教育研究, 2022, 49 (5): 88 – 101.
- [36] Helsinki Schools' Curricula of Kapylan – Peruskoulu [EB/OL]. (2021 – 02 – 22) [2024 – 09 – 27]. <https://ops.edu.hel.fi/kapylan-peruskoulu/>.
- [37] CHETTIPARAMB A. Interdisciplinarity: a literature review [J]. repor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Group,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2007 (1): 1 – 64.
- [38] MALINEN O P, VÄISÄNEN P, SAVOLAINEN H. Teacher education in Finland: a review of a national effort for preparing teachers for the future [J]. Curriculum Journal, 2012, 23 (4): 567 – 584.
- [39] SAMSON J F, COLLINS B A. Preparing all teachers to meet the needs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pplying research to policy and practice for teacher effectiveness [J].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2012 (4): 1 – 29.
- [40] 熊淳. 日本教师专业标准发展研究新探 [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09, 27 (1): 113 – 116.
- [41] HAMANO T.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eacher education in Vietna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2008, 34 (4): 397 – 410.
- [42] ZEICHNER K. The turn once again toward practice – based teacher education [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2, 63 (5): 376 – 382.
- [43] ZHANG H, KANG K. American PARCC and SBAC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Assessment System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2017, 10 (1): 190 – 196.
- [44] WONG A F L, CHUAN G K. The practicum in teacher training: A preliminary and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improved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School Partnership Model in Singapore [J]. Asia – 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02, 30 (2): 197 – 206.
- [45] SHARPE L, GOPINATHAN S. After effectivenes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ingapore school system?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2, 17 (2): 151 – 166.
- [46] 罗刚, 范国睿. 新加坡的校际均衡与质量保障 [J]. 全球教育展望, 2009, 38 (5): 47 – 50.
- [47] ZHANG T. Reform Measure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bout Japanese Private Universities [J]. Creative Education, 2016, 7 (1): 189 – 197.
- [48] 李克建, 胡碧颖. 国际视野中的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兼论我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观的重构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2 (7): 15 – 20.
- [49] 田鹏颖, 张琳. 论系统观念视域下党对基础教育的全面领导 [J]. 中国教育学刊, 2021 (5): 11 – 15.
- [50] 习近平.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 – 09 – 11 (1).
- [51] 郭巍青. 政策制定的方法论: 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43 (2): 40 – 45.
- [52]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J]. 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 2019, 16 (3): 247 – 249.
- [53] 上海市实验附属小学. 徐汇区“实施学期课程统整 主动推进二期课改”第二轮实验研究课题计划 [EB/OL]. (2006 – 09 – 22) [2023 – 12 – 25]. <https://ssfx.xhedu.sh.cn/cms/data/html/doc/2006-09/22/25416/>
- [54] 孙刚成, 杨娅娜.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教学变革维度与前沿分析——基于 WOS 源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J]. 教育与教学研究, 2023, 37 (11): 27-44.

[55] 靳玉乐, 李子建, 石鸥, 等. 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核心议题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1): 24-35.

[56] 孙刚成, 刘玲. 教育家精神的发展脉络、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6 (5): 199-120.

[57] 孙刚成, 左晶晶. 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研究现状、热点与趋势——基于 Cite 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 21 (1): 62-69.

[58] 吴萍, 吴海洋, 王菲. 我国中小学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施路径探讨 [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2 (3): 296-300.

(责任编辑: 孙永泰)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SUN Gang – cheng¹, YANG Hua – hua^{1,2}

-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2. Lizhi Senior High School in Liuhe District, Nanjing, 211599, China)

Abstract: Basic education has fundamental, supportive and leading mission responsibilities in building a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ed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experience of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by taking 633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core journals included in the Web of Science (WOS) databa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nally,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earch on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 basic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has forming a relatively rich research knowledge base.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ocus on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e hot topic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a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the maximum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evidence – based high – quality education governance path. Also, it highlights the diversity of evidence sources, the softening of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fields. And it takes practicality as a value pursuit, systematical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takes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and emphasize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value – added of evaluation. Based on this, China should build a correct view of teaching quality centered on students; follow the evidence – based decision – making principl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decision support; integrat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lement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learning issues; standardize the admission criteria for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and clarify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establish a growth feedback adjustment mechanism,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other work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er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